

传统与现代的斗争游戏

叶 启 政

由启蒙理性所衍生之“现代化”，自从十九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帝国主义之军事与经济势力东渐以后，扩展至亚非社会，成为全球性的潮流。对亚洲社会而言，大体上，“现代化”乃经由社会精英（尤其知识分子）的诠释和推展而呈现。这样透过具社会正当性之象征权力持自发推动的社会革命，其特色在于制度机制的构筑，是一种由上而下的重构过程。因此，“现代化”的推进乃是一种强调战略之总体阵地战，它的特质是攻击的，以极具体系性的理路为后盾。

“现代化”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它必然冲击到一般芸芸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世界，与社会大众既有的认知与感受模式传统产生面对面的对抗互动。面对着“现代化”之规模总体阵地战的攻击，社会大众缺乏以相对等的攻略来对抗。他们采取的是小规模、零星、随时随地机动制宜的游击战，其特点是以沉默、迂回、消极方式的防卫战，找空隙以“对策”来对抗“政策”。这样的策略运用对“现代化”此一高度体系化之巨灵，虽未必能完全颠覆其内涵的体系理路，但却足以破坏此一理路的完美自延性，具有渗透与颠覆其正当性的契机。

社会大众以其习惯经验的实作模式的传统理路，未对付外来“现代化”以理性论述为主导的体系理路，致使精英主导之“现代化”所衍生的全球化与社会大众以自然态度所引发的区域化，成为两股一体之两面的并存现象。基本上，区域化的产生代表一种活力，在“现代性”之全球化的趋势下，从朝向“死亡”之途中，为人类文明留有再生的契机。

作者：叶启政，男，1943年生，台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一、火车和铁轨——一个社会学的启示

法国思想家第撒都(deCerteau, 1984)在一篇冠名为《铁路行与监禁》(Railing navigation and incarceration)的文章中，以铁轨为例来刻划人为造物对自然(在此文中专指空间)所产生的意义和作用。他以为，火车内部的人和物，以及火车之外的物，都是不动的(immobile)。重要的是铁轨，它切穿了空间，使原本一体的土地变成为“速度”的化身，也被切割呈现出“距离”来。同时，火车中的机械基本上也是不动的，但人却可以靠着它的作用移动自己的身体，并且沿着铁轨贯穿空间。人也藉着车箱的窗户往外观看，因火车的移动，产生了距离感。于是，钢铁和玻璃等等的组合产生了冥思者或具有灵知的诺斯谛教徒(gnostics)。它终使做为存有体(being)与目击者(spectator)分离开，但也因此互相联结在一起(112—113页)。

对人而言,任何人为造物都负载有一些潜在的意义,尽管这些意义常常并不为一般人所察知到。譬如,火车和铁轨的发明和出现,很自然地会组成一套“理性”的范式行为模式和制度化设施。最明显的就是车站这样的空间构造首先顺应而生。有了车站这样的空间设施出现,接着来的就有了购票、订位、查票、候车等等一些相当标准化的行为模式出现,也有了车箱等级的“制度化”区分或准点与否的心理期待等等现象。同时,在车站附近,更因旅客拥至,各种商店与其他种类的交通设施因而兴起,在空间上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人文区位景观。

可是,火车和铁轨所可能牵动出来一联串的意义并不是自明,而且,在人们彼此之间,认知上未必有共识。情形甚至是,意义的内涵,尤其,其客体化(objectification)的形式在人群当中孕育、转化时,互相之间其实常常是有着裂罅,产生着如布笛尔(Bourdieu,1977)所谓的“误认”(misrecognition)。这种“误认”与其在人际之间所必然产生的认知裂罅,无疑是极为正常的,因此,“误认”对当事人永远是正常的且往往是正确的认知。但是,人与人之间的误解于是乎也就可能产生,而且未必可能完全化解,这种“误认”现象的存在,可以说是使情形如此的基本关键之一。

当我们把场景转移到十九世纪末,火车冒着浓烟急猛地划过中国的华北大平原。我们看到一批农民冒着生命的危险躺在铁轨上,企图阻挡着火车前进。他们憎恨这个“现代”怪物,因为当铁轨贯穿了祖先的坟地时,把风水破坏了。而且,当火车轰轰之声振耳之际,它也吵醒了寂睡坟中祖先的灵魂,这一切都是极为不敬的冒渎,会为他们和子孙带来噩运。他们疑惧、困惑、也抗拒。然而,遗憾的是,到头来,他们似乎还是抵挡不住,火车依然冒着烟奔驰在铁轨上向远处消逝而去。

二、“现代化”做为—具建构体系性的社会图景

英国人为了鸦片问题在1840年向满清政府开战以后,时下流行的所谓“现代化”就随着军事科技、商品经济、与传教等并济的方式渗透进入中国,当然,中国人也以不同的方式来对应,对社会产生了不同、也程度不一的影响。

“现代化”是一个极具统摄综合性的概念,其内涵指涉十分笼统,也有相当抽象的面相,并非一般人能够充分掌握的。荷兰社会学家吉德维(Zijderveld,1979)即曾指出,“现代化”一辞在西方世界,甚至全世界,已成为陈腔滥调的口头禅(Cliché),人们几乎都可以朗朗上口,仿佛熟悉、了解得很清楚。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自从欧洲人首先在意大利地区进行了以人本之人文精神为主轴的文艺复兴运动,尤其经过启蒙时期的进一步推动,“理性”可以说是主导欧洲(尤指西欧)文明发展的基调。“理性”做为一种哲学论述的主张或立场,有一定的文化和历史内涵,承受着、也支撑出一定的社会结构框架,自然地剔透出特定的表现形式与内容。发展迄今,大体上,科学与技术成为表现“理性”最具体且最为基本的历史骨架,而诸如“控制”、“效率”、“扩展”与“便利”等被形塑成为社会中的优势基本价值。伴随而来的是“发展”、“进步”、“繁荣”、“自由”、“平等”、“民主”或“富裕”等等迷人的憧憬,炫惑着人们,也渗透进入社会中的各个面相。“现代化”的华夏基本上即建筑在以类似这些极具历史亲近性之华丽概念为建材的地基上。在十九世纪中叶以来,欧洲人把这样的建筑风格当成典型模式,有意或无意地推销到亚非社会,成为全球普遍流行的社会建筑模式。

当原本深具欧洲特殊历史风格之“现代化”变成普遍流行的潮流,其原本所内涵之“理性”也溢出了原有的历史与文化格局,与原本不具历史相干性的异类文化和社会体质接上头。这样的历史哲学以论述身份反过来成为主导人类的实践行为,形塑了历史自身,也使得“现代化”之“迷思”(myth)色彩更加亮艳,也更加炫惑。^①披着科学理性的外衣,挟持着具体的技术成就,它压缩着时间和空间,也压缩了人类的灵魂,引导着全体人类文明的进展。^②结果,“现代化”或许就成为是如布鲁门伯(Blumenberg, 1990: 3-4)所谓之“人应对自己、也为自己负责”的最终迷思。它给人类无限美丽、丰富的憧憬,但也可能为人类带来史无前例、也无以匹比之毁灭性灾难。

特别以军事技术和科技商品几近绝对优势来慑服、炫惑亚非社会的人们,是“现代化”魅力的根本条件。这个科技优势性产生了效应的扩散现象,影响所及,使整个欧美工业文明的诸多面相,包含器用造型和功能、社会制度、思考和认知模式、价值和信仰体系以及生活方式等等,均呈现出主导优势性,成为亚非社会之人们竞相模仿的对象。^③在这样的历史格局之下,“现代化”以一个“完形”(Gestalt)的姿态君临傲世。“完形”的意思指的是,“现代化”做为一种以西方理性为主轴所开展具建构性的历史形式,它具有相当程度拟似有机体所呈显的“体系性”(systemness)。^④这也就是说,“现代化”乃内涵有一定的构成理路,可以自成一格,透过种种客体化(objectified)之具体形式来表现。它仿佛成为一个具自主性、无所不在,且无所不及的“巨灵”(leviathan),俯瞰着大地,指挥着人世间芸芸众生的走动。

三、从“社会”到“生活世界”

倘若“现代化”是一个霍布斯(Hobbes)言下的“巨灵”,则“社会”(society)更是另一个更大的“巨灵”。“社会”这个名辞一向被社会学者当成是一个有“实体”指涉的概念来看待。它或许如帕森斯(Parsons, 1951)之分析实在论(analytical realism)所营构具 AGIL 四种功能的“社会体系”(social system),或如更早之涂尔干(Durkheim)之客观实体论下,所说具道德意涵之事物性(thingness)的“社会事实”。不管如何,“社会”以外在于个体,且对个体具有约制作用的君临姿态自主地存在着。这样“实体化”社会的概念,看起来既清爽又利落,许多社会学家都相信,从未质疑过。

其实,仔细地思索,“社会”是否为一个自主自存的实体,是值得进一步探究的课题。^⑤从人的立场来看,纵然我们接受有所谓“社会”的存在,它并非无时无刻为人们所深刻感知到的。在绝大部分的状况下,它靠着各种“客体化”的媒介(如语言、法律条文、商品、电视、法院或开会等公共建筑……等)为中介,以上述之“体系”(尤其制度化)的形式,沉默地渗透进人们的每日日

① 冠西里克(Koselleck, 1988)即指出:自从启蒙时期以来,在理性主义所开展的历史哲学驱策下,欧洲人即以实践方式来客体化哲学论述。不管这种哲学是否属真,历史哲学因此变成历史本身。

② 卡西勒(Cassirer, 1990: 78-80)认为,神话概念的特质是压缩性的,如蒸馏过程一般,把东西蒸到只剩下一点点,而这一点点即是“全部”。“现代化”在第三世界中就常具有这样的特色,像魔法一般法力无边,控制了整个社会,也渗透进入每个细节空隙之中。

③ 有关“文化优势之扩散性”的讨论,参看叶启政(1991)。

④ 此处所用之“体系性”与“系统性”(systematicedness)有关,但意涵上有层级差异性。“系统性”指的是组成成员间的关系有一定既成而相当定型的表现形式,而“体系性”则意涵,除具“系统性”外,由成员组成的关系有一具相当封闭与自主的“整体”性,它可以自我规约,具备如鲁曼(luhmann, 1990)所谓之“自我指涉”(self-reference)与自我衍生(autopoesis)的现象。

⑤ 晚近西方社会学者对传统之“社会”实体观已有所质疑,例如依里亚斯(Elias, 1978)以“形构”(figuration)来取代。布西亚(Baudrillard, 1983; 1988)则有以“the social”来替代之说,依里亚斯(1991)亦有类似之主张。有关之论述,可参考于米(Game, 1991)或莱斯与乌里(Lash & Urry, 1986)。

常生活世界,理所当然地左右着人们的认知、感受和行为。大体上,往往只有在集体产生亢奋或处于危机情境时,“社会”才会经由诚如爱国情操或民族感情等等的名号,为人们所感知,也为人们所确认、肯定和强调。因此,平时,“社会”做为一个具整体性之概念,只是以幽灵的姿态暧昧而虚幻地飘浮着。

对人而言,真正的“社会实在”毋宁地是一个人以其清醒意识状态之肉身,实际直接或间接地呈现在别人之肉身与物质世界之前的每日日常生活场域。因此,身躯的展现最为根本。此一“我”的身躯并不只是一个展现在空间中的客体,而是一个人对生活世界之空间安排所有经验的基本要件。它是人在生活世界中任何情境 从事一切协调功夫的中心。

身躯于是成为营造“社会”此一图像,或任何具社会性之图像(如“现代化”)的具体感知和表现要件。倘若“社会”是存在,它存在于每一个围绕着人之身躯而形塑之当前此刻且此地的“我”世界。“现代化”的呈现也是一样,只有嵌进人的当前此刻且此地之日常生活世界,它才有意义,也才产生作用。因此,更明确地说,当两个或两个以上之这种“我”的身躯,以面对面或乃至非面对面方式,产生主体间(intersubjective)之互动,“社会”这图像才有产生的可能。于是之故,重要的是互动所产生与形塑出来的场域。对人而言,这个场域才是“实在”,任何事物与活动都要回归到这个场域,意义才能充分地彰显出来。

每个人的生活世界(包含互动所形塑之主体间场域)都有一个界限相对清楚的范畴。这个范畴区分出熟悉和陌生,也分隔出我与你。在范畴内,是熟悉,也是属于我的;在范畴外的,则是陌生,不属于我,而是你或他的。以隐喻的方式来说,每个人的生活世界范畴有中心与边区地带之区分。对别人而言,一个人生活世界范畴的中心地带是隐密不可及的,虽然它是人表现行为的基本动力来源。边区则是人与人相处的交汇区域,它决定什么人和事物可以走进来,什么人与事物则只能停留在边区做有限的接触,或甚至完全摒除在外。因此,边区地带是叫人留步或停止的地方,是检查站,也是让当事人可以“看穿过去”的中介地带。

第撒都(1984:128)说,人们靠故事(story)做为桥梁来搭联人们的边区。“故事”指涉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沟通使两个人的边区搭联起来,也告示了边区的存在,把它标示出来;沟通更是使人与人之间愿意而且可能让对方走进中心地带的必要社会机制,虽然这并不是很常见,也不是很普遍。总之,人之生活世界的边区因人们互相接触而成为两个身躯的分离点,同时也是共融点。到底是分离点或共融点,常常是两难,有着暧昧、模糊的灰色地带。当互动之两造分别来自具异质又陌生的生活背景时,这个现象尤其明显。对自感处于劣势处境的一方,这种两难困境又往往更加严重。“现代化”对中国的冲击,正是使许多中国人有了这样的处境。

四、挥舞“现代化”法器的祭司——社会精英

以中国为例,当西方“现代化”特别是在科技、军事与经济联合阵线的推动下呈现出来时,对许多中国人,它所呈现之内容的物理性质,尤其是其社会与文化意涵,是陌生的。因此,他们面对时的态度往往是保留、持疑,乃至是排斥,且视为邪恶的。^① 由于一开始进不了依附在“现

^① 如清同治朝的大学士倭仁即视西法为毒害。他说:“…议和以来,耶稣之教盛行。无识愚民半为煽惑。…今复举聪明隽秀,国家所培养而储以有用者,变而从夷,正义为之不伸,邪气因而弥炽。”他以为用了西法之后,“西洋各国,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累。仰见圣虑深远。虽用其法,实恶其人。今天下已受其害矣!”(见《筹办夷务始末(六)同治朝,卷47》)。

代化”之任何表现体的边区,自然地也就无法顺利沟通。然而,当中国一再失利于西方帝国主义者——失利是一事实,可能严重地伤害了中国人的自尊心,但是,中国人也因此对此一外来且具异质性的“现代化”有更多认识的机会,逐渐可以走进它的边区(当然是透过与西方人和他们所生产的文化物品接触),与之沟通。在这样的状况下(尤其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对许多中国人而言,他们不但不排斥“现代化”而视为邪恶,相反地把它变成为神圣的法器,被视为“富国强兵”与“救亡图存”之希望所在。

倘若我们仔细考察历史文献,并佐以社会学的学理来看,在中国人(尤其所谓有识之知识分子)对“现代化”之威力有明显认知意识之前,“现代化”其实即早已以潜沉方式渗透进中国的土地,威胁着中国人既有的传统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默默地侵蚀着一部分中国人之日常生活世界的既有惯域(habitus)与场域(field)。^①然而,毫无疑问的,“现代化”对中国人的冲击是具层级之差异的。随着地区、人的认知条件、社会位置或利益基础等等条件的不同,人的生活世界边区的展现方式不一样,对“现代化”的认知与反应自然也就跟着有所不同。

于是之故,虽然,“现代化”来势汹汹的,企图以全盘通吃的方式沉默地潜入中国的土地,但是,中国人对其威力有所感受、认识,并继而会转化成为具体行动来贯彻的,大体上,一开始以社会中的精英阶层如企业家、技术专家、官吏或知识分子为主。一般,他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场域伸展性较大,而且,一旦面临外来且异质性高之文化场域的刺激,虽会在其惯域之边区树立起某种的防卫,但是,也往往较易撤防,接受此一新文化场域的洗礼。尤其,当意识到此一新文化场域具有高度之生存机会控制性,^②足以决定自我场域能否继续维持的契机时,某个程度地撤防,接受新文化场域的洗礼,更是无以避免的。

当社会精英利用手中拥有的特定社会资源,尤其透过具正当性之权力的运作,以其既定有限的认知,一方面诠释“现代化”的内涵,另一方面挥舞着“现代化”的法器,洒豆成兵般地以具体之“政策”行动纲领来贯彻其理念与信仰。他们决定了“现代化”之实践的内容和方式。这样以制度化形式的实践场域来呈现,其所涉及的基本上不是个体性之“私人”生活世界场域而已,而是以集体性之公共场域为主。它可以是整个国家、或某个区域、或部分大众(如购买电视机之消费大众)。

在上文中,我们提及“现代化”是西方理性展现的一种历史形式,它有一特定的内在文化理路为经纬,呈显一极具逻辑一致的系统性物质。这样的特质基本上是“论述”(discourse)为优位而以“实行”(practice)为手段来贯彻。对承受它冲击的中国社会精英,这种以“论述”为优位主导、且极具“集体”能动性的社会动员,乃意涵“理论”是行动的前提,也是支撑基石,因此,意识形态具有优位性,十分重要。它所缔造的是一具高度“体系”性的沉默的社会革命,其所威胁、乃至颠覆一个社会既有体制传统的,是大规模且具整体架构性的。权力运作所及,一方面可以像毛细孔作用一般是缓慢而沉默地渗透,另一方面却有如挥洒罗网般地,是一种“面”的覆盖。因此,虽然有经纬系统支撑,看起来似乎是全面性的罩盖,但却也留下无数的网孔,让人们有喘息与活动的空间。

这样以社会精英为主力,让“论述”带动出“政策”,并以集体成就为目标的“现代化”实践活动,打的是有如强调战略,以对整个社会理路规范进行全盘转化和颠覆的总体阵地战。精英们

① 借用布笛尔之用语(1977)。简单地说,惯域指的是行动当事者已形塑且复具形塑力的一种习惯心理取向(disposition),而场域指的是环绕着惯域之四周的种种客观之物质与非物质条件。

② 有关“生存机会控制性”此一概念,参看叶启政(1991)。

挟持着足以支配别人之种种具正当性的社会资源,以有整体系统之“理性”考量为战略,在社会中各个重要据点布阵,采取严阵以待、蓄之以发的方式进行攻击战。这种攻击战的目标在于摧毁旧有体制,并进而重建秩序。林敏生(Lin, 1979)以“偶像的全盘破坏”来刻划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其实正是对“现代化”所具的这种军事比喻性质的另一种诠释,企图点明的是这种具攻击性、强调战略之大规模总体阵地战的特点。

五、挣脱“现代化”魔障的牺牲——社会大众

中国民间流行着一句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充分地展现一般社会大众做为一个群体来看待时,其行动所可能具有的社会特质。不管政府的政策设计得多么周密详细,老百姓总找到空隙来对应以维护或遂行自己的利益。在“现代化”过程中,情形也是一样的。尽管在社会精英挟持着优势之正当化权力大力推动下,“现代化”以泰山压顶般的“体系”化方式,对一般社会大众的生活世界进行着严厉而绵密的总体阵地攻击战,社会大众却似乎经常是好整以暇般地以四两拨千斤的手法来释放“对策”。

总地来看,社会大众可能不是“现代化”的引发者,但却必定是承受者。**做为承受者,社会大众并非如社会精英一般,会较常抽离以“我”为中心的自身,而以具诸如国家、社会、区域或人民为考量之“整体”意识来对待“现代化”。相反地,他们有的通常只是以环绕着自己之身躯来建构之“我”为中心的世界观,或顶多是由“我”为中心而依亲疏远近向外扩散之人际网络建立起来的,以利益或情感为分殊基础,具区域联防性的“区域”世界观。因此,面对着精英所发动以论述理路为优先导引基础之“现代化”大规模总体阵地战的攻击,社会大众并无力发动以另一种论述理路(尤指以本土传统为基础者)为后盾的总体阵地战来对峙。他们把这份工作留给另外一批保守的知识分子或其他精英,而只能以其有限狭囿之生活场域为基地,利用空隙,靠种种掩饰手法,在被“现代化”所征服的大地上,进行小规模、零星、片面、不定时、不定点,但却也是随时随地推动的游击战。这种游击战基本上没有战略,也不可能有战略,有的只是以个体或有限数量之个体联防并强调视机而动之战术(tactic)。“点”式的联合战线是其基本的作战形式。**

防卫性的机动战术,不是以理论为先导,而是以应变的实作行动为重点。这样的防卫性战术的运用是他们“攻击”对方的基础。以手边可资运用之资源,藉阳奉阴违的伪装手法机动灵活地运用,是他们所使用之基本战术。事实上,面对着“现代化”以种种科技创新物和制度机制的“体系”化运作,社会大众纵然如孙悟空一般,有七十二变之本领,也逃不了如来佛之手掌。他们所能做的只是以自己最为熟悉的传统习惯方式(即以其惯域)来理解,并见招拆招般地来对应。于是,当他们为了确保坟中祖先灵魂的安宁,为了维护原有之“风水”,他们只有不惜以肉躯这个最原始的武器,以卧轨这样最原始的方式来抵挡火车此一“现代化”的科技怪物,尽管他们可能被认为无知、迷信或愚昧。当然,最后他们似乎也挡不了火车此一现代化科技产品的横行。

又如,当选举时,投票柜原本有企图以“客体化”之物的形式,负载着民主所涵蕴之伟大的理念和情操来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意思,但是,这种理念能否为一般大众充分领会,而其情操也为一般大众所持有,事实上是大有问题的。人们是会到投票所在选票上打了圈,也把选票投入柜子,完成民主政治的选举手续,但是,它所反映的极可能不是什么贯彻“选贤与能”之民主理性或自由意志的表现,而只是向金钱贿赂屈服的具体表现,或是人情压力的化身,或是暴力威胁下的无奈服从,或是媒体操弄印象的欢愉回应而已。

很显然的,一般社会大众并不、也往往无能力充分符合“现代化”的内涵体系理路,而让个人实作理路与体系理路合一。毋宁地,他们乃运用其生活世界之惯域中既有的理路与种种资源,从事零星而区域化的游击战,往往以沉默、消极、而迹近乱流扰乱式的方式,来对抗“现代化”之体系理性所开展的精心设计。在这儿,他们展现本土传统对抗外来现代的威力,也同时让两者在他们的生活世界里有了对话,产生某种巧妙结合,虽然这样的结合并不是精英们(尤其怀着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推动“现代化”时所期待和乐意看到的,而且甚至是显得牛头对马尾,不伦不类。但是,谁也不能否认,这样沉默地对“现代化”之体系理路(也是攻略)进行迂回、消极的拆招“对策”功夫,相当具有韧性。它们分散在各个边区(即每个人的生活世界场域中),神出鬼没,着实不容易一网打尽地加以全部歼灭的。

六、结 论

社会大众以其惯域中的实作理路为后盾,靠着实作领导论述的方式来对抗“现代化”巨灵的威胁。其所展现的集体性毋宁地是仅具特殊区域性的因果共识(causal consensus),而非“现代化”之体系理路所企图展现具普遍意涵的逻辑一致性(logical consistency)。^① 这样以因果共识为基础的认知方式,对强调逻辑一致性之“现代化”体系理路,无疑地是一个极具干扰的“乱流”,足以以小搏大地破坏了“现代化”体系之逻辑架构的完美与自圆性,正如一颗小石头可以搅乱了一潭平静的春水,起了无数的涟漪一般。

总的来说,社会大众的区域防卫游击战或许无法完全抵挡得住精英主导下之“现代化”的总体攻击阵地战,但却可以相当程度地靠着小规模之区域性的零散骚扰,让本土传统的文化基素与外来现代文化基素产生汇流。“现代化”原有的体系理路虽产生了结构制约性的威力,却始终无法完全征服人们。祭司企图控制牺牲,但是,牺牲并不是坐以待毙,他会沉默地反扑,颠覆了祭司的神圣地位。某个程度而言,祭司可能反过来成为牺牲。到头来,到底谁是祭司,谁是牺牲,实在难以区分清楚。在这样的情形下,事实上,“现代化”体系理路之优势性所开导出来的全球化,始终是向由社会大众生活世界所展现的区域化“妥协”。两者总是以一体之两面的姿态并存着。这个区域化,认真地来看,是促使人类文明有更进一步创新的分离点。它是使文明显现活力的契机,因为“现代化”所衍生之全球化现象所可能导致的最终结果是死亡。对亚洲人而言,这尤其是一个值得细思的严肃课题。

主要参考文献:

1. 叶启政:《文化优势的扩散与“中心-边陲”的对偶关系》,载叶启政著:《制度化的社会逻辑》,台北:东大,1991, P153-192。
 2. 卡西勒(Cassirer, E.):《语言与神话》,于晓等译,台北:桂冠,1990。
 3. Archer, M. *Culture and Agency: The place of Culture in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 (下转第 31 页)

^① 借用亚瑟(Archer, 1988)之说法。简单地讲,所谓逻辑一致性指的是,在西方理性主义支撑下,以为透过科学程序与方法以及逻辑,人们可能获致具普遍真理宣称的知识。这些知识的特点即在于命题之间具高度逻辑一致性。相反,所谓因果共识性指的是,人们经由习惯性的经验认知,在一定文化与历史背景下,对外在事务形塑了一定的且具共识的因果论述。它可能与科学理性或逻辑是相悖的,例如,认为生病乃因住宅之风水不好所导致的。

十年代中国社会学的主要开拓者,又是七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学恢复和重建的主要领导者。中国社会学具有注重社会调查、理论结合实际的优良传统,中国社会学界对“只有在本国的土壤里才能生长出中国的社会学”(费孝通语,1985)抱有明确的信念。近十几年来,我们开展的小城镇研究、城市家庭研究、农村改革和农民问题研究、社会结构转型研究、阶级和阶层研究、社会指标研究、社会分化和人口流动研究、社会学基本理论研究,等等,对国家决策和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赢得了社会的赞誉。目前,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正值大好时光,我们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丰富实践做为学科发展的肥壤沃土,有一支素质较好、事业心较强、初具规模的专职和非专职的社会学研究和教学队伍。相信有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形成和发展必将为亚洲社会学的崛起作出积极贡献。出席本届大会的中国社会学界愿意虚心向亚洲各国同行请教,相互切磋,合作交流,共同提高,增进了解,加深友谊。

本届大会有 200 多位亚洲社会学家欢聚一堂,盛况空前。为了便于交流和讨论,大会组织委员会经过磋商,拟定了六个题目:一、亚洲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二、亚洲的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三、亚洲的工业化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四、21 世纪亚洲的社会保障;五、21 世纪亚洲地区的家庭与生活品质;六、21 世纪亚洲社会经济发展、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我们希望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讨论,能具体地展示和理解亚洲崛起的社会学意义。

我们希望,第六届亚洲社会学大会将成为 21 世纪亚洲社会学崛起的奠基礼!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张志敏

(上接第 38 页)

4. Baudrillard, J. *In the Shadow of the Silent Majorities*. New York: Semiotext(e). 1988.
America. London: Verso. 1988.
5. Blumenberg, H. *Work on Myth*. The MIT Press. 1990.
Bourdieu, P.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eCerteau, M. 1977.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trans. by S. Rendall)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6. Elias, N. *What is Sociolog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8.
The Society of Individuals. Oxford: Blackwell. 1991.
7. Game, A. P. *Undoing the Social: Towards a Deconstructive Sociology*.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1.
8. Koselleck, R. *Critique and Crisis: Enlightenment and the Pathogenesis of Modern Society*. The MIT Press. 1988.
9. Lash, S. & J. Urry. "The dissolution of the social," in W. L. Wardell and S. P. Turner (eds.) *Sociological Theory in Transition*. Boston: Allern and Unwin, 95-109. 1986.
10. Lin, Y. S.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9.
11. Luhmann, N. *Essays on Self-Referenc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12. Parsons, T. *The Social System*. New York: Free Press. 1951.
13. Zijderveld, A. C. *On Cliché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9.

责任编辑:张宛丽